

还记得妈妈用过的上海化妆品吗?(下) ◆ 李霞 昴喻暄

紧俏吃香的化妆品

热衷于社区文艺活动的姚臻是在1980年当上新娘的,她记得那个年代结婚,亲戚朋友所送上的新婚贺礼大多是花瓶、脸盆、热水瓶等一些日用品,而在所有的新婚礼物中,她最喜欢的就是一套精致亮眼的化妆品。那时化妆品成为了新房里最亮丽的装饰品,这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上海年轻人结婚,新房里即使没有冰箱彩电,但是拥有一套化妆品礼盒,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1968年就进入上海家化厂的王忆瑛老人还记得,改革开放后,她所在的上海家化厂生产的化妆品进入了国内的市场,很多化妆品在百货商店里不但畅销,而且紧俏。于是在化妆品厂工作的王忆瑛在朋友中间也变得吃香起来。她回忆说:“1980年代以后结婚的年轻人,她一定要买一套蓓蕾的、露美的化妆品。就是要结婚了,这套化妆品一定要放在家里,人家来了以后很羡慕的。这套化妆品比较齐,它里面的化妆水,还有唇膏、粉饼,新娘化妆都齐了。谁结婚了给她买一套,她们是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外面那个时候买一套是很贵很贵的。买一套送去也是很有面子的,那个时候有一套化妆品是很稀奇的。”

对于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化妆品还是个稀罕的东西。邵隆图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研发中国第一套全套化妆品的情形:“1980年1月3日,刚刚过好元旦,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国家经委、轻工业部都下达了一个指令性的任务,就是要搞一套中国全套的化妆品。这时候我们原子弹已经上天了,高科技都已经不少了,就是没有一套化妆品。”而当这一套化妆品走进普通中国老百姓家的时候,它也曾作为国礼由上海市政府送给当年访美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

尽管成套的化妆品生产出来了,但是很多人都还不会用,仅仅把它作为梳妆台上的摆设。于是在那几年,上海女青年们最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学化妆。



■ 那些年妈妈用过的护肤品

暗香浮动别样智慧

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带领的摄影队来上海拍摄新闻影片。在他们的镜头里,上海人衣着很简单,穿戴很简朴,灰、白、蓝就是当年这座城市的色彩。那时的上海女人都是素面朝天,美容化妆似乎和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在那个香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香风毒气的年代,上海女人的爱美欲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聪明智慧的上海女人总会找到巧妙的办法让自己成为人群中的一道风景,她们用火柴当眉笔,用自制的火柴来卷发。

吴华芳阿姨也用过这样的小妙招:“我们老早用自来火。就是火柴一划,划好以后,给

它烧掉一些,熄灭后前头一段不是一点炭质的嘛。就拿这个来画眉毛,这个画出来呢,很自然很自然的。”

那个年代,上海很多的弄堂里都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球炉子。而弄堂里的很多女孩子都用自制的火钳或者火夹在煤球炉上烧热以后来卷发烫刘海,因为那时候,上海的理发店里是不允许烫头发的。当作家马尚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看到过弄堂里的女孩子在煤球炉上烫头发。他称之为火上的功夫:

“一个小姑娘大凡用过这种火钳的,她的师傅一定是她的母亲,或者是她的姐姐,是母亲和姐姐言传身教。这真的是考验上海女人能否成为合格的上海女人的一个火上的功夫。这个火钳要在火上放的话,你不能时间太久。不能太热,如果太热的话,头发一定会焦掉的。但你也不能太冷,如果太冷的话,它卷不起来。而且在卷的时候,你手势一定要很干净利落。不能碰到头皮,如果碰到,头皮要烧焦的。”

那些年里在煤球炉子边上用火钳来卷烫头发,就像一个厨师做美食那样是要掌握火候的,在那个美丽不被允许的年代里,上海的女人们还是向往着美丽。马尚龙认为,这是上海女人非常了不起的一点。美和钱无关,你有钱可以美,我没有钱也可以美。这么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能力,才是被全国人民所津津乐道的一种上海女性。

如今年逾花甲的胡绍铭也是上海家化厂的老职工,那时候他在厂里负责广告业务。他记得当年不但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做各种美容化妆品的广告,厂里还成立了美容队,搞了美容热线电话,去普及美容知识,传授化妆技巧:“他们更多关心的就是我们美容队的美容知识的普及,那么我们当时设立了一个美容热线电话,那也是走得很前面的。第一条,全天候的,甚至于后来扩大到365天,就是每个节假日也有人值班。第二个就是美容队下基层,当时最多的就是大学,还有工厂、机关,就

是美容队一个现场的美容示范表演,怎么保护皮肤,当时很受欢迎啊。”

精致优雅永恒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辟了四个经济特区,很多上海人涌向了深圳特区的沙头角中英街,他们最感兴趣的商品就是香皂、洗发露和丝袜等,而且大包小包买回家。那个年代风从南方来,很多上海的个体户小商贩从深圳、广州等城市批发采购各种衣服和化妆品,在上海的华亭路上摆摊叫卖,使得上海这条本不出名的小马路成了热闹非凡的时尚街。

也就是从1980年代初期起,上海人的文化生活中兴起了摄影热,而且彩色照片取代了黑白照片。拍照上镜头,女孩子们自然要精心地美容化妆一番。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上海女性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总会放一支唇膏,一盒面霜。

当各种美容化妆品大量充斥市场时,多数的上海女人都很会打扮自己,她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脸当成各种色彩的调色板,她们追求的是一个雅,把握的是一个度。如果谁的化妆过于浓艳,她们就会用“乡气”这个词,来表达不喜欢。

在上海,如果说一个女人很精致优雅,这或许就算是很高的评价了。而要做一个精致优雅的女人,就要先从精致优雅的美容化妆做起。马尚龙为此想出了一个词,来形容他心目中精致优雅的海女人:“我曾经用‘适宜’两个字来形容上海女人,既形容上海女人的一种内心的文化,也形容上海女人一种外在的打扮。适宜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恰到好处。我觉得就是说上海女人她可以把自己往恰到好处这个方向去打扮。”

人追求优雅的生活,追求美丽是永无止境的。在上海这座浪漫的城市里,打扮精致的女人越来越多,她们精心地呵护着自己的美丽和优雅。爱美的上海女人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永恒的风景。

摘自《档案春秋》

文学的生命

——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5.与巴老的目光交汇

1996年4月16日,机会终于出现。在出版社上班时,我突然得知,我社美术编辑陆震伟要去华东医院为巴金老人拍照。这几年,陆震伟先生用自己的好相机,为许多卓有贡献的世纪老人拍摄艺术人像,以备将来某日,举办别具一格的摄影展。我立即与他冒雨骑车到了医院。

一进入巴金的病房,只见宽敞的房间里,早已聚集了不少人士。大部分都是我所熟悉的朋友和老师:作协机关的徐铃、陆正伟,老作家王西彦和巴金的胞弟李济生等人。靠近阳台的一边,搁放着《文学报》赠送、由徐福生拍摄的巴金巨幅照片,相片四周簇拥着五彩缤纷的鲜花。李济生站在巴金身边,只见一位内穿军装、外套白褂、操着川音的小兵,正在用湿毛巾轻轻地替巴老擦脸。

老李将我引到巴老面前,热情地做着介绍:“这是修晓林,我们出版社的年轻编辑,他爸爸、妈妈都是老编辑,也是老作家。”此时,巴金的眼神深情又静静地停留在我的脸上,又与我的目光作着温暖的交流与摩擦。他一定有一些话要问我,可是,这时坐在轮椅中的他,由于年衰体弱,动作极其迟缓,连他的两个手掌都已蜷缩,难以伸展,这使我们都觉得很难过。但是,我却强烈地感受到,巴老的一颗真诚的爱心和他的博大思想,仍在猛烈地跳动和燃烧着。我似乎觉得,我与巴老的目光,正在这安静的病房里交汇、碰撞着,发出噼啪耀眼的火星。

这时的陆震伟先生,正快速地将摄影机架架,从不同的角度,连续按动了快门,接着又为我与巴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虽然这只能是令人遗憾的无言面对,然而这时的我,已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病房中,大家都用最深的敬意,看着这位人格魅力感人至深的名人、伟人。

这时,巴金突然说话了,他用略带颤抖的

声音说道:“西彦,白羽今年好多了?”人们都为巴老清晰又活跃的思维,以及病中仍然挂念老友的深情所感动。

坐在侧边沙发上的王西彦立即回答:“白羽比你小十二岁,今年八十了。”此时的巴金,已经陷入了很深的回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6月12日,当我到京拜访刘白羽时,说到这动人的一幕,眼见刘白羽的眼眶湿润了,他显然非常激动,立即为我书写了“以生活的真实燃烧人的心灵”的宝贵赠言。刘白羽老师还对我说:“读巴金,不仅是读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读他的人品,读他奋斗的一生。”

1999年10月26日,“巴金星”等小行星的命名仪式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有一颗编号为8315的闪烁着巴金光辉的“巴金星”行星星体,在太空遨游,永载史册。

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一颗行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是对巴金毕生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懈精神的高度赞誉,又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每当我在晴朗的夜空,遥望那满天的星星,就会想到,为了与我心中景仰的伟大作家见面,从十四岁到四十六岁,从幼稚到成熟,从漫不经心到急不可耐,真是久久地等待了三十二年!

我与柯灵先生的交往,远不如许多师长和同事那般熟稔和随便。在1995年3月,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夏衍追思会上,在1997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当代文坛大家文丛”(巴金、冰心、夏衍、柯灵、施蛰存文集)新书出版新闻发布会上,我都是隔着几排座位,仔细听着他的发言,想着他风格独特、深沉清新、思维浩大、富于艺术魅力的文字,看着他浸润着忧患意味的眼光,感受着他如泉水般善良而又明澈的心灵。

而在我从柯灵先生文章著作和高风亮节的行为中,不断汲取的关于如何做到和保持高尚人品、文品的思想营养和精神力量,更是对于我的心灵磨练和人格锻造等方面的成长,起着犹如阳光雨露对于小草鲜花生长般的重要作用。

19.涌进十多个警探

邹韬奋披上呢大衣,对妻子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又小声叮嘱她打电话。转脸对法国人说:“可以走了。”两个中方警察侦探从邹韬奋的小书房里抱出一些信件和几十本小册子走出来,嘻笑着与邹韬奋搭讪:“我在弄口亲眼看见你从外面回家,在弄口下了黄包车,很快走回家。不过睡了两小时吧!”

邹韬奋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受到监视,心想救国会的朋友一定有几个同时遭到被捕,不免挂念起沈钧儒,老人六十多了,恐怕难以经受住折磨。

警车风驰电掣驶向卢家湾巡捕房,邹韬奋走下囚车,缓步迈上捕房门前的石阶,无意间抬头看见一个熟悉的女性身影由巡捕挟持着走在前面。前面的女性好像也意识到后面的人犯多半是自己的同案犯,便转过脸,冲邹韬奋报以淡淡的微笑,笑中没有凄惨,显出友爱、坚定。邹韬奋紧走几步,试图追上她问一下其他朋友的情况,巡捕伸手抓住了他的双臂。

审问后,邹韬奋无可奈何地接受搜身,领带、裤带、鞋带全被缴去了,好像生怕他会在狱中自杀。当狱卒命令他摘下眼镜时,邹韬奋犹豫了,一戴数十年的眼镜摘去后看不清前面的路。史良隔着木栏杆,大声向巡捕官员抗议,“邹先生是社会上地位的人,不必这样搜查,眼镜也应该让他留用。”此刻,她忘了自己也是囚犯,仿佛还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行使律师的权利。抗议丝毫不起作用,眼镜还是被取走了。邹韬奋拖着一双没了鞋带的皮鞋,眼前朦朦胧胧,跟着狱卒走到监狱的门口。

在监狱门口,邹韬奋重又遇见了史良,发现站在史良身边身材高大披着大衣的章乃器。此刻章乃器的境况与邹韬奋差不多,领带什么全部缴去了,脚下的皮鞋也没有了鞋带,趁巡捕与狱卒在交接时,邹韬奋轻声问:“沈先生怎样了?”章乃器回答:“大概也被捕了。”

他俩分别被关进两个囚室,铁锁撞击铁栅栏发出沉重的响声,令人惊心。

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沪江大学教授章乃器,卖掉别墅后搬入法租界台拉斯脱路慈惠村(今太原路)不久,否则他们三人不可

能被同一所看守所收押。

章乃器自被迫辞去浙江实业银行的职位后,全部精力扑在救国会的事业上。他身为全国救国会的执委之一,分管财务和宣传工作,他的家成了救国会的秘密机关,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编辑部就在他的家里。

22日晚上,章家客厅集聚着一部分救国会基层骨干,正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和对时局的分析,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一些路远的人留宿在章家。章乃器与妻子胡子婴安排好客人,回房休息。不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章乃器惊醒,他猛地坐起,很快意识到自己劫数难逃。他首先想到暂住在家里朋友们,在妻子的协助下,把留宿人员安排到另一间房里,自己下楼开门。

门开后,涌进十多个警探,一下子把章乃器包围住。为首的法国警官用英语对章乃器咕哝了几句。章乃器点点头,回答说他要打电话给朋友。他拨通宋庆龄寓所的电话,告诉宋庆龄他被捕了。他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位君子,他是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武装自治会的重要成员,这个中共外围的秘密组织,一直被南京政府视为仇敌。

他放下电话,又提出上楼换衣服,法国警官见他并无抗拒之意,表示同意。他上楼穿衣,妻子一边嘱咐他穿暖点,一边替他披上大衣。两个包探在书房收拾他们需要的证据,对章乃器的妻子说:“不是我们巡捕房要来,是上海的警察局长要我们来打扰的。你看,他们还派人和我们一同来。”果然,楼下的十几个警探中有几个与法租界巡捕装束不同的人,正在屋内四处翻腾。

警探们带着几捆救国会的宣传品,上了车。章乃器敞着大衣走出大门,来到户外。西风扯起他的衣襟,早谢的头顶上几缕长发不安分地搭在眼前。他扣好大衣,用手指整理一下头发,登上警车的铁梯,坐在一侧,警探们紧挨在他的左右,警车启动,章乃器禁不住离开座位,走到一扇小窗前深情地凝视着车外。西风烈,黄叶滚动的寒夜,唯有自家居室的电灯亮着,透出一份温馨。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